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大红灯笼(香山革命纪念馆藏)

红灯笼是我国节日里营造喜庆热烈气氛的重要物件。香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两盏巨大的红灯笼,它们曾悬挂在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上,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共同商定,于10月1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主席台就设在天安门城楼。为了体现庆典的气氛,悬挂8盏大红灯笼的方案从布置图纸中脱颖而出。

灯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外观上也与天安门城

楼相契合,既能衬托出开国大典庄重、严肃的氛围,又能充分体现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喜庆气氛和民族特色。

设计方案通过了,但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30多米高的天安门城楼,那得挂多大的灯笼啊!经过评估,挂在天安门上的灯笼,高度和直径都要超过2米。这么大的灯笼,可不是谁都能制作的。为了找到能制作灯笼的人,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北京城,终于找到一位手艺人,他叫尹作滨。

工作人员说明尺寸之后,尹师傅吓了一跳。这么大



开国大典上的红灯笼

的灯笼,别说看,听都没听过。灯笼还没开始制作呢,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地涌了出来。别说材料准备、设计过程,就连制作场地,都成了问题。将近3米的大灯笼,尹师傅家里根本放不下。

于是,尹师傅干脆把制作材料搬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在那儿做起了灯笼。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制作,饿了,就一边干活一边啃干粮;困了,就倒在灯笼的骨架旁睡一会儿。

就这样,8盏周长约8米、重80公斤、有史以来最大的红灯笼悬挂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庄重、气派、热烈、喜庆。那时的天安门城楼已经落成500多年了,目睹过封建王朝的兴衰,遭受过外国列强的凌辱,也聆听过五四运动激昂的口号声。这是它第一次装扮上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大红灯笼,幸福地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开国大典上,8盏大红灯笼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分外耀眼,它们和天安门城楼完美地融为一体,古老的城楼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夺目光彩。

夜幕降临,8盏大红灯笼齐刷刷地点亮,把城楼照得亮堂堂的,城楼下也是灯火通明,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199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北京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天安门城楼进行装修,城楼上的8个大红灯笼宣告退役,换成了折叠式新型灯笼。原来的部分红灯笼,作为革命文物由博物馆收藏。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平台

尊老养老、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众多的文化遗存中,鸠杖颇具代表性,这一物件,不仅承载着敬老理念,而且象征着礼仪制度。

所谓鸠杖,就是把手杖的扶手做成一只斑鸠鸟的形状,前是权力的象征,后来特指赐给高龄老人的手杖,成为国家尊老养老的标志。中国人常常以谐音表达思想感情,“鸠”者,“九”也,象征极高、极深、极多、极大、极广,又具有吉祥尊荣之意;“鸠”者,“久”也,有长久、持久、永久之意。所以赋予斑鸠长寿之意是非常恰当的。

鸠杖在先秦时期是长者地位的象征,汉代更是以拥有皇帝所赐鸠杖为荣。汉高祖刘邦在位时,做鸠杖赠送高龄老人;汉宣帝在位时,建立了高年授王杖的制度,规定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由朝廷授以王杖。老年人一旦得到这柄手杖,就具有了一定的特权,可享受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

尊老养老早在西汉时期即已形成较完备的制度。以鸠杖为代表的汉代敬老养老标志性文物虽然在全国许多地方均有出土,但在甘肃省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鸠杖和《王杖诏令册》汉简却是我国古代尊老养老方面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历史实物资料。《王杖诏令册》中,对有70岁以上老人的倾斜政策的记录,涉及政治地位、法律援助、经济支持、生活关怀、社会扶持等诸多方面,持有鸠杖者拥有诸多方面的特权:可以自由出入官府不下跪,可以在御道(皇帝专用道路)上行走;从事各种商业经营免于纳税;路上行人见持鸠杖者要让道,儿女要是虐待持有鸠杖的老人,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所以说,一根小小的手杖,意义重大,几乎成为华夏之邦尊老养老的文化意象。

甘肃省博物馆的这支彩绘木鸠杖是现在出土所见的所有汉代木鸠杖中,彩绘保存最完整的一支。该杖为松木质,杖长196.5厘米,鸠高9.7厘米,鸠长21.2厘米。鸠身以白粉作地,用红、黑二色绘出羽毛。杖杆粗细均匀,鸠鸟横卧杖端,口含食粒,双眼炯炯有神,注视前方。鸠颈后有黑色羽圈多个,翅膀和尾部羽毛舒展略长,线条均匀流畅,绘制精细大方。鸠底部刻有圆眼以套杖。木鸠雕工精致,造型优美,彩绘逼真,楚楚动人,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武威汉墓出土的彩绘木鸠杖(甘肃省博物馆藏)

古以鸠杖倡导尊老

王其英 李元辉

“人民昌”“中国强”

李洁 张哲浩

铜镜,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延续至明清时期,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日前,一枚铸有“人民昌”“中国强”铭文字样的汉代铜镜在西安首次展出。

“人民昌”“中国强”汉镜为圆形,直径22.3厘米,厚0.7厘米,半球形钮,钮座饰一圈以短线间隔的几何纹,保存完好,铸造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

镜背铸有47字铭文:“天禄辟邪日有喜,上有龙虎四时置,长保二亲乐无事,子孙顺息当大富,侯王寿命长,多贺君家人民昌,四夷皆服中国强”,其字体兼具隶书的古朴和悬针篆的空灵,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带有“人民昌”“中国强”吉语铭文的铜镜。

该铜镜内区铸有龙虎相踞的纹饰,中区天禄、辟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持百枝灯、大象传信、羽人飞仙,均为汉代盛行的祥瑞象征。

镜缘西王母戴胜、币连胜、九尾白狐、金蟾、祥龙逐金乌等,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25种形态各异的通神精灵,呈现一派虎跃龙腾、凤舞龟行、羽人献瑞、神兽奔驰的盎然生机,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健康长寿、吉祥好运的追求。

铜镜整体图案结构紧凑,布局涉及对称式、放射式、同心圆式的综合运用,有很强的主次、疏密的层次与节奏感,既生动自然又整体和谐。此款青铜镜采用范铸法制成,线条勾勒清晰,又用浅浮雕、高浮雕工艺加以区别装饰,分内外区,体现了汉代合金、雕刻技术和铸造的工艺水平与独特匠心。



“人民昌”“中国强”汉镜上的“中国强”字样(大唐西市博物馆藏)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的西周早期的“何尊”。

有研究认为,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国”两字已经从象征土地方位转向国家的概念。

新疆博物馆藏有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另也发现有“中国安宁”“人民安乐”“多贺国家人民息”“中国安宁并不扰”等铭文的汉代铜镜。

但同时带有“中国”和“人民”文字的铜镜目前仅见于武汉博物馆藏汉代“多贺中国人民昌”以及大唐西市博物馆珍藏的这枚“人民昌”“中国强”铜镜,可谓极其罕见、意义非凡。

娄烦兴旺庄造像碑

张贵桃

娄烦县米峪镇乡兴旺庄村有两通北魏红砂石造像碑,是娄烦县境内发现有关佛教的最早实物资料,2003年3月,娄烦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笔者分析,造像碑之所以出现在娄烦境内,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娄烦的地理位置有关。

造像碑刻于北魏正光四年(523),一通为两面造像碑,高1.20米,宽0.40米,风化严重。碑阳有二层龕。上层为二龙构成的圆拱龕,龕内一佛二弟子,弥勒佛结跏趺坐于莲台,内着僧祇衣,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左襟一角搭于左肘,裙摆呈八字形;二弟子站立,左边一佛脚下雕神兽,右边一佛脚下刻神鸟。下层龕被凿毁。碑阴也有二层龕。上层龕内一佛结跏趺坐,双肩瘦削,着通肩式袈裟,裙摆呈八字形。下层龕风化不清。

另一通为四面造像碑,高1.20米,宽0.35米。碑南侧为三层,上层为释迦、多宝二佛结跏趺坐。中层圆拱龕,龕内一坐佛,两侧各线雕一菩萨,桃尖形头光,披巾敷搭双肩至腹部,上绕至臂后下垂,下着百褶长裙,下摆略向外移,足踩莲花台。下层线雕世俗供养人。

碑东侧分三层。上层为二小龕,雕坐禅比丘。中层雕一立佛二弟子,佛头残,内着僧祇衣,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右侧衣衬搭于左肘,裙摆下垂。下层线雕供养人。

碑北侧圆拱龕内雕一坐佛,龕外左右雕二弟子。佛结跏趺坐,着通肩式袈裟,裙摆斜向两侧,呈八字形,用平直刀法雕刻。

碑西侧风化较严重,可见一圆拱尖楣龕,龕中雕一结跏坐佛,龕下方刻有题记,多漫漶不清,仅依稀可见“比丘……阎星成、阎月成、阎雷成、阎方廓。夫大口正光四年岁在”等字样。

两碑中的佛像和菩萨面部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时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艺术形象,佛像和菩萨四周的神兽、神鸟,衬托出佛国仙境的景象,这些都与云冈石窟佛教造像的特点相似。

佛教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传入中国后,发展到北魏,由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使这一王朝成为佛教文化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上自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庶民,都信奉佛教。北魏王朝对佛教教义有研求提倡者,当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帝以后,北魏高僧辈出。到孝明帝即位之初,专权的胡太后还特意以朝廷的名义派出沙门宋云、惠生等出使西域,从印度带回大乘妙典170部,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娄烦境内,从北魏的建立至灭亡,一直在其版图之内,距北魏前期都城平城较近。1993年版《方山县志》载:“《永宁州志》:魏孝文帝忧,避于此山,因取名孝文山。”说明孝文帝曾在北魏太和十四年(490)九月至十五年(491)正月这五个多月的时间之内来娄烦境内的云顶山狩猎,峰岭底村曾有魏孝文帝庙。大同云冈石窟的开凿,从北魏成帝和平初年(460)起,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止,历时60多

年。而娄烦的这两通造像碑,刻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正好在开凿云冈石窟的末期。这个时间点也许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兴旺庄造像碑并非民间自发的修寺庙、塑神像行为,而是雕刻师们在云冈石窟工程收尾之际,到周边地区雕刻佛像,弘扬佛法,是云冈石窟佛像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组成部分,对佛教向民间传播、佛教文化与古老的中华文化融合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是研究北魏时期宗教历史和宗教造像艺术重要的文化遗存。



娄烦兴旺庄村北魏红砂石造像碑

文物里的「中国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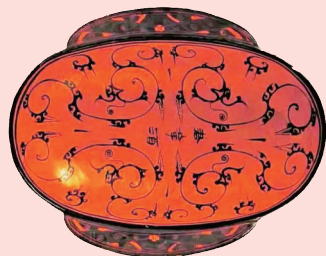
权吉

红色代表着火之色、血之色、生命之色,是中国文化别具特色的标志,人们冠之以独一无二的名字——“中国红”。

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全景进程中,红色一直在人们的审美意识、情感认知和精神生活中处于主流地位,并具有正向意义。人们常用“万紫千红”形容春天美景,用“赤胆忠心”表达爱国忠诚,用“近朱者赤”引导交友向善。孔子认为红色是大雅之色、正统之色。文天祥写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篇。梁启超用“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比喻少年中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红色一直被赋予权威、雅正、热烈、温暖、喜庆、吉祥、美好、成功、富贵、忠诚、希望、力量等积极文化寓意。这份对红色内涵的追求延绵不绝,对民族强盛、日子红火追求永不停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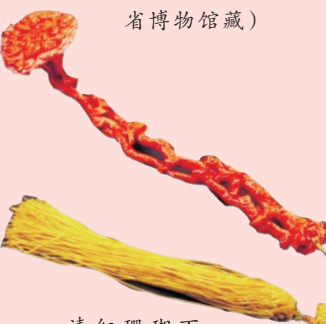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盆(国家博物馆藏)



马王堆汉墓“君幸酒”云纹漆羽觞(湖南省博物馆藏)



清室变釉石榴尊(国家博物馆藏)



清红珊瑚万字云纹如意(故宫博物院藏)



清“英和”铭凤纹红丝石砚